

02 95. 3

(总第六十七辑)



要

●市长李耕涛与天津小百花剧团

●抗战期间的南开中学

●世纪沧桑——生琐记

●王一民与天津事变

目

●长江自有浪花在

●漫话京剧脸谱艺术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津)新登字 001 号

执行编辑:张玉芳 李国丽

版面编辑:康 明

校 对:汤 洪

张敦书(特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5·3(总第六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世纪书局总店 189 号)

天津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44千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308-X/G·1062

· 定价:5.00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5·3(总第67辑)

往事追忆

- 长江自有浪花在 方 纪(1)
世纪沧桑——一生琐忆 罗 兰(29)
八十自述 翁开庆(47)

抗日风云

- 沦陷时期的天津音乐活动 张肖虎(58)
抗战期间的天津南开中学 张国贤(64)
孙立人将军抗战轶事 薛庆煌(83)
回首临沂战役 庞国华(93)
忆抗战两次战役 安锡钊(95)
何应钦向美国人交枪 赵 震(120)

历史回眸

- 王一民与天津事变 王律飞(99)
韩复榘的两耳光与五百元 梁季民(110)

汉奸李际春其人 E(30/24) 曹兆荣(111)

商海话旧

实业家严智怡 王翁如(117)

糖业“洋货局子”兴衰录 杨荣久 杨雨村(121)

趣谈天津商标 王英奎(130)

津门第一家女子商店

——华贞女子职业传习所 颂 石(142)

天津煤调会征收的运照费 张树维(129)

艺苑谈往

市长李耕涛与天津小百花剧团 甄光俊(145)

良驹幸遇识马人 童 稚(164)

京剧脸谱艺术在天津 那 韧(166)

一次难忘的联欢演出 甄光俊(180)

○读者与编者○

对《天津黑旗队内幕》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 褚凤亭(98)

封面照片说明 (165)

长江自有浪花在

方 纪

我本名姓冯名文杰，由于是阴历羊年出生，故小名羊子。1919年我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殿试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是冀中平原较富裕的县，自古就有“金束鹿”的美称。祖父冯新业，为人刚正豪侠，好打抱不平，在村里颇有名气，多有“慷慨悲歌之士”的遗风。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河北时，祖父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高蠡暴动”；在抗日战争中，他又挑起村农救会主任的重担，为全村的安危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后不幸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父亲冯洞庭，是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又会染丝线的手艺，每逢农闲时，他便推着挂满丝线的小车去赶集，深受人们喜爱。束鹿县是很有名气的皮毛集散地，四周有很多鞣制皮草的作坊，生产的羊皮筒子和各种皮货畅销华北。由于父亲的丝线做得好，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冯老庭”，后来父亲积累了一笔钱，与人合伙开了一个小店，利虽薄，也足够糊口。但好景不长，在我四五岁那年，军阀混战，闹得民不聊生，父亲的生意因连年赔本无法维持，被迫关门。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到姥姥家。母亲陈素珍生长在比邻通土营村的一个书香人家，她娴静贤慧，识文断

字。姥姥家的祖上曾出过一位翰林，还留下一块功德碑。

儿时的记忆里，姥姥家有很大的院子，但人口很少，特别是家里没有男人，因此显得毫无生气。我们的到来，无疑给这个大院里增添了欢乐的气氛。每天天一黑，我们便躺在炕上，听姥姥讲各种好听的故事。姥姥有讲不尽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还有素霞姨妈，是她对我进行了启蒙教育，为我日后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素霞姨妈是位老处女，她将全部心血连同她的“传家诗书”都倾注到我的身上。她给我讲解“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和“精卫填海”等故事。她以传统道德教育我，并把我关在外祖父的书房里，教我读书写字，我也因此读了一些外祖父留下的那一屋子书。素姨还手把手地教我写字，先是教我在仿文上描字，嗣后又教我临写柳公权的《玄秘塔》和颜真卿的《勤礼碑》。素姨很严格，对我写的每一个字都认真指出不足之处，教导我临帖时要细细体会字体风格和韵味。慢慢地我便迷恋上凝神、用力、临帖的练字方法。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喜好书法，不断练习，实乃得益于素姨的严格管教。

后来，我回到本村上了小学。记得小学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做新民”三个大字。开始还不理解这三个字的含义，后来经老师讲解方明白其中深奥的意义。当时正是北伐革命时期，各种新思想不断在传便、扩散，我们受了这些新思想的影响，小小的心灵也燃起了热情的火焰。记得当时老师还带领我们在操场上呼革，“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边喊边游行。这是我最早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一次活动。

1931年，我12岁，考上了束鹿县立中学。上中学不久，情发了疑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便了中国东北三省，华北也面临着存亡的危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我在束鹿县立中学念了3年书，初中毕业后，家里我有力量供我继续升学了，祖父、父亲到处求人，为我寻求谋生之路。

二

1934年秋，我离开了家乡，告别了亲人，只身到北平谋生。我到北平后，经一位亲戚推荐和担保，来到了前门外大街的德泰皮货店，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那时的学徒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名为学徒，实际上一进门就是当“保姆”，侍候老板一家的吃、喝、拉、撒、睡。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晚上老板一家人都睡了，我才能睡觉。真像《三毛流浪记》中描绘的那样，三毛的生活可以说是我们学徒生活的真实写照。

学徒这碗饭实在难混，白天打水、扫地、接人待客忙累了一天，晚上还要侍候老板抽大烟。一次，我实在困极了，手里端着的茶碗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碎了，老板顺手拿起烧红的烟签子扎在我的下巴上，至今还留着疤痕。我记得当时德泰皮货店订有《平报》和《益世报》等报纸。《益世报》上登有反映学徒生活的文章，我看了很受启发，也写了篇反映学徒苦难生活的文章，寄给了《益世报》，没想到文章居然很快在报上发表了，这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老板看后大为恼火，生气地对我说：“我的店小，养不起你，你给我滚蛋！”就这样我被赶出了店门。不久经人介绍，又到一家文具店去当学徒。这家文具店老板原是西北军中的一个下级军需官，在军队里捞了些钱，退役做买卖了。他待人狠毒，无论是拖地、擦柜台、上下门板，还是站柜台卖货、出门送货，只要他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有时候他把一块大洋扔到地上，让徒弟们去争抢，他在一旁哈哈大笑。在这家干了一段时间，我实在气不过老板对学徒的态度，辞职了。

再次失业之后，我住到一位远房亲戚家中，整日无所事事，失学、失业使我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我多么渴望再进学校门学习啊！正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在北大经济系上学的同乡，叫曹盼

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热情地鼓励我,并借给我一些书刊看,经常与我谈心。在他的帮助下,我不但心境好了,而且似乎感到人生应该追求些什么。后来他鼓励我去上北师大预科班,争取参加当年的会考。他为了使我摆脱生活的困境,把我带到北大三院(沙滩)去住,后来又到大北历史系作旁听生。在北大时,我和一位叫屈洪涛的同学住在一起。这位屈洪涛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我走上革命和文学道路的启蒙者,但是我对他了解太少了,而且自当年分手后,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屈洪涛介绍我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如鲁迅从日文翻译过来的《铁流》等和许多苏联名著,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天屈洪涛带我到山东会馆,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教俄国文学的赵先生。从此,我经常参加“左联”活动,结识了刘曼生(谷牧)同志,并经他介绍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一名成员。那时我常参与刘曼生和清华大学学生魏东明(杨戍生)等同志组织的文学活动,在一起谈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大作用,因此产生了“为革命而文学”的抱负。在反动当局白色恐怖的文化围剿下,我们成立了“风沙文艺社”,创办了《泡沫》文学杂志,第一期于1935年8月5日出版。《泡沫》是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刊物,共产党员魏东明任主编,我们负责编辑工作,“左联”负责发行。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杂志社设在一位社员家里,其父当时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要员,这样一来反而保险了。后来《泡沫》停刊。我们的刊物不仅有目的地介绍了苏联革命文学,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还巧妙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时把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思想寓于小说和诗歌中。

三、在冀东抗日斗争中(1935—1945)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三周年。

“当我进入北大作旁听生时,曾遭到反动政府破坏的中国北大

地下支部重新建立了，由刘导生（刘文卓）任支部书记。根据当时北平市委和学联党组的决定，各大学以请愿方式发动群众，然后转向示威游行，掀起抗日反蒋运动，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那时，我虽不十分清楚党的决定，但只要是学校组织的革命活动，不论是上街演讲，还是示威游行我都积极参加。1935年12月9日那天，天气特别冷，狂风吹在脸上犹如刀割一般，我们的游行队伍行进到西四牌楼附近时，被武装警察拦住了去路，皮鞭、枪托、大刀和水龙头一齐向我们袭来，我们手挽手，毫不畏惧。最后，在军警的武力镇压下，队伍被冲散了。军警们在大街小巷搜捕我们，我带领一批受伤的同学躲进了我在沙滩居住的学生公寓。

在悲壮的大示威运动和总罢课后，北平市委和学生联合会党组决定：组织平津学生联合行动的扩大宣传队，深入民众，做宣传鼓动工作，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当时组织了3个宣传团，总人数在450人左右，我参加了第一团。

1936年1月3日夜，我们冲出军警的包围，连夜离开北平，迎着刺骨的北风，徒步向河北的中心地带行进。每到一个村镇，我们都召集村民大会，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散发传单。蒋介石对我们的扩大宣传活动十分恐慌，命令地方当局要“严格制裁”。因此，我们这3支队伍一路上都遭到了军警的镇压，第三团到高碑店时遭到北平派去的便衣队及当地保安队和警察的镇压。我们一团和沿途被驱散的二团合并后继续南下宣传。2月1日我们到达保定后，被当地军警镇压，后押回北平。离开保定前，我们曾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扩大宣传团”改编成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回到北平后，“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各分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M·G·S。我参加了这个革命团体。1936年春，我又参加了“抬棺游行”，在这之后，由中共北大支部讨论，魏东明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

“一二九”运动后，中共北平地下党指示学生运动要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我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先是到武邑县一所中学以当老师为掩护，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不久，我又到束鹿县在中共“直南特委”领导下开展农村工作。我一回到家乡，就积极投身到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中去了。通土营的姥姥家也成为“直南特委”的秘密机关，我们夜里印文件，姥姥白天出去撒传单，我们在屋里开会，姥姥在门前老槐树下放哨。特委书记马国瑞同志来了，姥姥给他烧热炕；吴立人、李子谦等同志来了，姥姥亲自给他们烙饼，做豆豉面。在那阴霾笼罩全国的困难时期，姥姥和我们一样，坚信党的事业一定能成功。当年这些回忆，构成了后来我写《献诗》的主要意境。

“七七”事变时，我正在北平汇报工作，根据当时形势，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立即到农村组织抗日武装。我带着党的指示回到老家组织抗日队伍。那时在束鹿县境内，有一支约五六十人的土匪队伍，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官逼民反的情况下走上这条路的。经过联系，我只身一人去见土匪头子，竭尽全力宣传共产党组织抗日武装，保家卫国的主张。听我做宣传解释工作的土匪挤了一院子，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头头都表示要跟我走，但也有个别坏人冲进来要扣留我。我当即掏出手枪，打死了一个土匪，乘他们慌乱之际，我带着一部分愿意抗日的人来到通土营村，加上村里的部分青年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游击队。

不久，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党组织命我选拔一些年轻骨干人员组成一支武装拉出去，在与当地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前提下，独自寻求战机，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秋的一个早晨，我告别了家乡的亲人，带着这支不穿

军装的队伍，越过北方辽阔平原，跨过崇山峻岭，直奔淞沪战场。当我们赶到南京附近时，上海、南京已相继沦陷，我们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们只得回头北上，边打边走，边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上帝不负苦心人，我们终于在安徽屯溪附近找到了当时负责军工的李涛同志。经过党组织的安排，我把队伍转交给了李涛同志，只身一人到18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

1938年4月，我到达武汉，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此，主任是董必武，叶剑英任副主任。当时正是需要人的时候，组织上命我在蒋南翔同志领导下做青年和宣传工作。不久，台儿庄战役开始，叶剑英同志派我带领一些人组成59军战地服务团去慰问在台儿庄作战的汤恩伯部队。我们在徐州附近和台儿庄战场上进行慰问演出和宣传鼓动工作。

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战地服务团撤退到湖南长沙。到长沙后，我们住在湘雅医学院。当时由南京迁至武汉的中国红十字会在长沙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在长沙合办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的医务人员和流亡青年，经过短期卫生训练后，编成医疗卫生队，派赴全国各战区担任救护伤员和民众的工作。这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也在这里工作，她向中共长江局建议派党员去救护总队做教育工作。中共长江局采纳了她的建议，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队长、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主任林可胜利博士建立了联系。林博士是新加坡爱国华侨，生理学博士，他赞成我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主动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系，要求派人到训练班帮助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我和毛华强、黄群三人以流亡青年身份入班受训，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我们被编入救护总队第十七支队。这个队是训练班的教导队，负责辅导学员学习。我们在学员中进行政治宣传的方式是在每天的“朝会”上做时事讲话，课余举办

时事座谈会，开展歌咏活动，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此期间，我拜会过史沫特莱同志，她送我一套由她签名的《资本论》，并介绍给我读了一些有关美国劳工问题的书籍。1938年夏，我们奉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的指示，在救护总队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地下支部，隶属中央长江局。郭绍兴同志任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我担任青年干事并负责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支部成立后，发展党员10多人，“民先”队员20多人。

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国民党命救护总队由长沙撤到桂林；从这时起，“中共红会支部”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随救护总队后撤。这时，党组织分配我到战地救护总队第11支队开展工作。这个支部领导是郭绍兴（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卫生厅长）同志。我们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到桂林后我被调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作宣传工作。这期间，我写了一些抗日的宣传文章。

1939年6月，我随同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当年，我曾借风季、公羊子、杨子等笔名在武汉、长沙、桂林和重庆等地的报刊上发表诗歌、报告和文章。我们到达重庆时，蒋介石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背景下，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投降路线，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措施，制造了冀中深县、湖南平江等地的多次惨案，还将大批爱国青年送进集中营“甄别受训”。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青年，一批批地送往抗日根据地和延安；我记得当年有许多青年是经重庆去的，看着一批批青年去了延安，我也提出申请要去延安。对此，周恩来同志曾找我谈话，说：“在太后方也是抗日。”要我去《新华日报》工作。后来，我因十分想往革命胜地延安，周恩来同志批准了我的申请。我们去延安的青年，坐满了好几辆军用大卡车。我们身穿国民党的军服，由来时轮同志带领我们安全到达西安，住进了位于七贤庄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分批出发去延安。我带领王海涛等几名青年化装出

发，潜越了重庆政府设置的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延千里的五道封锁线，整整跋涉了一个来月，于1939年12月到达延安。我们伫立在延水河边，凝望着宝塔山上的红旗，高声欢呼：“到家了！我们到家了！”

五

我到达延安以后，先是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训练班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分配到陕北公学继续学习。1940年的春夏之交，我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工作，秘书长吴伯箫同志派我到住在文化沟的萧三同志那儿帮助工作。那时，萧三同志正在编“文协”的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我负责发稿和校对，抽空也写文章。记得我最初在延安发表的两篇稿件，是关于曹禺的《雷雨》和《蜕变》的戏剧评论，这是在萧三同志指导下写的，这两篇评论文章相继刊登在《大众文艺》上。我跟萧三同志一起工作了半年多，他待人非常好，教会了我不少东西。

记得1940年四五月间，茅盾同志来延安，我参加了延安文艺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由于我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便认识了茅盾同志，这时，他便把孩子韦韬委托我带到陕北公学去学习革命理论。后来，他把写于1940年10月4日延安南门外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交给我，发表在当时我已参与编辑的《大众文艺》上。他离开延安时，还将鲁迅先生的一份手迹留给我代为保管。这份手稿是茅盾同志特意为延安举办的纪念鲁迅的展览而带来的。茅盾同志很珍视手抄稿，这是他在1935年《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时所写的一封信，此信经鲁迅先生寄出时，先生代为抄写留的底。这份手稿，被我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在解放战争中，它经历过多处战场，辗转了两年多之后，解放后由周扬同志带给了我，我从皮箱里取出这份手迹，发表在建国初期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

刊》上。我与茅盾同志虽然结识不久，但在相互交往中，他以热情、诚恳地注重培养文学后辈的一贯风格，以及他才华过人的素质，指导我认识自己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帮助我这个初学写作的青年，选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1940 年底前后，我从边区“文协”调到设在文化沟的“文抗”去工作。“文抗”的全称是，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时的延安，有三大文艺组织，即“文抗”、“鲁迅艺术学院”和边区“文协”。“鲁艺”演出《炭冈》时，我还扮演过珍妮的丈夫。茅盾同志在延安期间，曾到“鲁艺”讲授过《中国市民文学》。

当年的文化沟，真是人才荟萃。我至今还能记起来的有吴伯箫、刘白羽、柳青、舒群、罗烽、马加、丁玲、魏伯、萧军、金肇野、欧阳山、周而复、李又然、草明、艾青、厂民（严辰）、逯斐、黑丁、程追、白郎、曹克、师田手、朱丹等 30 多人。那时的延安在文艺创作上存在两种倾向，“鲁艺”主张歌颂光明，“文抗”主张暴露黑暗，由于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个方面，当时的我，也难以区分两者之间谁对谁错，便不管“文抗”同志的倾向，抱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老师的心情，不论是上门请教，还是跟他们随意聊天，甚至从他们坦率的毁誉参半的争论中，我都长了不少知识，并同不少同志建立起良好的友谊。当时同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朱丹同志，我们虽然不住在同一间窑洞，但终是形影不离地去散步，同去开会听报告。那时，我患了关节炎，走路很困难，他便背着我上坡下坡，对于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他总是尽可能地帮我解决。那时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每日三两菜、一钱油，每人每月生活津贴只有 5 角，我们都隔三天给每人发一次蜡烛。由于我们都有夜间爬格子的习惯，所以一次发的路地点一我上都不够。所以大家把津贴差不多都用来买蜡烛了。那时，别说牙膏，连牙粉都买不起，大多数人都用土盐刷牙。夏天没有替换的内衣，男同志常常脱得赤条条地跳进延河，将内衣洗干净后着在河滩上，躲进水里，眼巴巴地等着衣服晒干。

1942年8月1日，我和黄人晓同志举行了婚礼，那天我穿的是一身洗干净的干部服，她身上穿的“礼服”是1940年春天她从泰国（她是泰国华侨）来延安投奔革命时带来的衣服中，选了两件旧衣服，拆开缝制的连衣裙。至于我送给新娘的结婚礼物，不是耳环，也不是戒指，而是两只西红柿——那是我跑出好几里，从我们菜地里摘来的。简陋的新房充溢着“文抗”同志的一片祝福。吴印咸同志在延河旁为我们拍了一张“结婚照”，成为永久的纪念。顺便说一下我们相识的经过。我们的介绍人不是某位同志，而是一篇新闻通讯。那时黄人晓是医院护理部的党小组长，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毛主席看望关向应同志》中提到的护士小刘，就跟她在一起。事后小刘把这件事告诉了黄人晓，她根据这件事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至今，我国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上都采用了这篇通讯。我当时读了这篇通讯后，去医院访问了她几次，便从心里喜欢上了她。

我在“文抗”生活了两年左右。在那段时间里，除了看书、学习马列著作和时事外，就是不分昼夜地写作和钻研写作技法。这两年在人的一生中，是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努力读书、努力写作，努力探索创作之道，时时刻刻地磨砺自己的两年。我从能借到的书籍中，学习并研究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厨川白村的艺术手法，尼采的“超人”学说，直到高尔基的从生活着的人们中间发掘出生活的真实意义，并用来揭示令人激动的生活典型。我勤奋耕耘，反复锤炼，试写了一些散文、小说、诗歌、报告，及诸如《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的评论文章，但拿出去发表的不多。至今我还留有印象的是两篇作品，一是诗歌《马》，另一篇是小说《意识以外》。这两篇作品，我开始使用笔名“方纪”因为“方纪”与“冯骥”谐音，同时以“纪”为名，是为了纪念自己在革命圣地开始了事业创作生活，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意识以外》，是我创作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在《文艺月

报》上刚一发表,有些同志向我道贺,也有些同志提出了批评,说我主张个性解放,宣传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篇小说塑造的典型性格,是我亲眼所见的一段往事的艺术再现,1940年春,有位名叫林兰的16岁女学生告别双亲,背着一把小提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她对革命事业有着无比的热情,可又对参加革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她酷爱提琴艺术,亦颇有天份,希望能在音乐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可组织上却安排她在医院里当护士。她理智上认识到这是战争环境下的革命需要,可一时又难以改变自己的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变得忧郁苦恼,最终导致精神失常。我采用心理描写的手法,把她写进了我的小说《意识以外》,并以主人公因长期自我压抑、患了精神分裂症为结局。

那时,我对革命文学应该表现什么,怎样表现,以及为谁服务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于延安当年所处的特殊环境还缺乏深刻的理解,认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应对周围事物有穷根究底的勇气,不回避现实,亦不粉饰现实,从现实生活中采撷五彩缤纷的典型性格,表现艺术的真实性。直到我参加文艺座谈会以后,才认识小说中所流露出的思想情绪与延安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求不相符,尤其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精神失常结局,致使作品失去了积极意义。文艺座谈会后,我才逐步认清了文学创作的方向,明确了创作的指导思想要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创作生活中一个新起点。

1942年4月的一天,刘白羽同志来找我,交给我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这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当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1942年4月27日

我们“文抗”参加座谈会的有几十人，现在大多已作古了，那次座谈会人很多，礼堂里坐不下，就到篮球场上去听毛主席讲话，唯独没有让江青参加。当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就在我们学习毛主席讲话的同时，“文抗”也开始了整风运动，大部分人转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参加学习，我亦在其中。当时人们称党校三部是文化人学府。

从党校出来，我调到《解放日报》社，在艾思奇同志领导下工作。适逢延安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在大生产运动的动员大会上，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报名参加纺棉花。我的家乡是产棉区，从小就见家里人、村里人纺棉花，因此心想这活儿不难，从小看也看会了。然而当我真正坐在木制的纺车前时，用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也抽不出一条完整的线来，锭子上还是我开始时缠上去的那几圈稀疏的引线。那些纺断的线头，都错综地交叉排列在地上，小组长看到我在嘟嘟囔囔地直着急，便跑过来，帮我调整了弦线的松紧，并在轮轴和锭鼻上加了些油，还纺了个样子给我看，我按照他的样子再纺时，不是拉得快、摇得慢，就是拉得慢、摇得快，结果还是断了两根线，小组长一边鼓励我，一边耐心地教，一直教到我摇的纺车不快不慢，锭子能成一条直线地转起来时，他才离去。晚上，我感到疲倦但又很兴奋，久久不能入睡，纺车那和谐悦耳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充盈心头。我在劳动中度过了严冬，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在大生产的庆功大会上，我获得了纺织能手的称号。我在劳动中体味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正是这种崭新的生活，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写出了小说《纺车的力量》。

《纺车的力量》，是我参加文艺座谈会后写出的第二篇小说。第一篇是《魏妈妈》。《魏妈妈》是我第一次运用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写出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内涵。关于这两篇小说，曾经有人发表评论说：“它们标志着方纪在文学生涯中开创了新的起点。”

在此以前的1942年12月，周恩来同志回延安时，曾于26日